

21.07

14

盐亭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盐亭县委员会编

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目 录

优良作风 铭刻于心·····	何 燁 (1)
铮铮铁骨深深情·····	廖仲宣 (5)
凛然正气蒙文通·····	廖仲宣 (10)
成都医生在盐亭·····	杨作清 (13)
刘定初抗战事略·····	卢高杰 (16)
蓝大顺进军盐亭轶闻·····	衡 平 (20)
盐亭修志史略·····	何天度 (23)
乡邦文物之瑰宝·····	刘泰焰 (30)
“二战”时期盐亭“工农前卫团”始末·····	王寿熙 (38)
征粮支前 剿匪安民·····	中共盐亭县委党史工交 (41)
民国时期盐亭田赋概况·····	何锦帆 (50)
潼保马路盐亭段之修建·····	何天度 (60)
盐亭工业概况·····	邓介民 (68)
盐亭水利事业的发展·····	唐家福 (72)

优良作风 铭刻于心

——记赵紫阳同志在富驿

何 烨

一九七八年是盐亭县富驿区遇上三年大旱的第二年。年前是秋旱加冬干，全区三百三十处水利工程大多干涸；一万一千亩冬水田，大部分脱水开裂。开春以后春干、夏旱、伏旱又连在一起。山坡上的小春粮食基本无收；预留行内种的旱玉米，长期处于半枯萎状态；四百八十个生产队，占三分之二的地方，人畜无水吃。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灾情歌：“大旱已两年，灾情大蔓延，万亩田开裂，千流水断源；禾苗半枯萎，人畜饮水难。”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刻，我们接到一个喜讯，五月十六日晚上九时许，县委办公室通知我们：“明天上午省委有位领导同志，要来富驿视察，希你们作好汇报准备。”我们接到这个通知后，又惊又喜，喜的是：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省委领导同志亲临视察，给我们工作增添了信心，鼓舞了斗志，使我们在大灾之年，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惊的是，我们的工作未搞好，解放后近三十年了，遇上干旱连群众的吃水问题都不能解决，不但问心有愧，还怕领导同志批评。当晚，我们区委几个人汇集了情况后，决定由我这个当班长的，向领导同志汇报。这一夜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

十七日上午八点钟，初夏的早晨，阳光灿烂，晨风拂面。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在盐亭县委书记李兴元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到了富驿。他一下车便和我们打招呼，并一一握手。他那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孔，一接触就使人有一个亲切的感觉。到了区委办公室后，他重新问了我们的姓名，并作了记录，参加座谈会的人不多，除赵紫阳同志和他的秘书外，县委是李兴元同志和农工部的陶明溪同志，以及八角区委书记杨福均同志和八角公社党委书记张先觉同志，加我共七人。大家坐好后，紫阳同志说：“川北这一带，经常有旱灾，趋利避害的方针是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还有待研究，据你们县委书记讲：八角、富驿搞了些麦、玉、稻，稻田一年三熟，既避开了夏旱，又利用了秋涝，你们重点把这方面的工作讲讲，兴元同志叫八角先讲。八角是张先觉同志汇报的，他重点汇报他们在八角公社建设大队，推行稻田麦玉稻连作的过程，他汇报得比较细致，从育秧、栽秧的时间，管理施肥的要领，当中遇到的问题，最终的产量，以及他们在几个队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用种用肥获得不同的效果等。紫阳同志听了满意地说：“看来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是稻田改制的方向。”接着是我汇报富驿地区的旱情，和群众在抗旱中的经验、教训；还汇报了我们在富驿公社幸福大队一生产队试种麦玉稻的情况，在我们汇报时，紫阳同志不但亲自作笔记，询问一些细节；有时还插话，介绍外地经验；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共同讨论，我们不懂的地方，他便及时指出，使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自始至终都感到很轻松，没有一点拘束，敢于畅所欲言。并且还学到了一些知识，受到了教益。比如在讨论一季晚稻用什么种好时，我说我们试验田用的一

代种，紫阳同志马上问：“你们这里海拔多少？”我说：

“我们住的地方是380米，垭上（指犁头垭）是400米。”紫阳同志立即指出：“你们注意一下，水稻杂交一代种，扬花需要的气温，最低是23度，最高是28度。海拔在400米的地方，九月二十日的气温是20度左右，在海拔380米的地方，九月二十日时气温一般在23度左右，是可以种的，上了400米就不行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想到紫阳同志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领导着全川一亿人民，工作是多么繁忙，而他对全省的气象情况和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特性，却了如指掌。说明他们工作是多么深入具体，博学多才，真是一位好领导，紫阳同志叫我们注意的问题，我不但作了笔记，还打了二重注意符号。因为，这个问题，在这以前我确实不明白。现在，省委领导面对面地指导、教育，既丰富了我的知识，又使我们工作今后少出偏差，这是多么难得的金石良言啊！我怎能不铭记在心呢？

紫阳同志的优良作风，还表现在他对下级的汇报，不仅要听，而且是那样十分注意的听，更重要的是还要认真核实。当我汇报到一九七八年仍计划栽一批一季晚稻时，紫阳同志问：“你们这里看不到一块水田又无水源，育秧的问题怎么解决？”我答：“我们育了点早秧，就是用一代种育的”；他问：“离这里有多远？”我答：“就在场口上”。他说：“我们去看看”。这时12点已过，兴元同志提议是不是吃了午饭去，紫阳同志同意了，午饭是在会议室用的，“四菜一汤”（他的秘书先就给我们打了招呼的，不准搞铺张。）午饭后，紫阳同志和我们徒步到了育早秧的场地——富驿公社幸福大队三生产队（后改为四生产队）。在育秧场紫阳同

志看得十分仔细，他还蹲下身去拣一些压着秧苗的土块，用手比量了一下秧苗的长度，较为满意地转过身来鼓励我说：

“你这个人，还有点创造精神。”又说：“遇上灾害就是要多想办法，战胜灾害，这是我们当干部的职责”。我回答说：

“不是我的创造，是群众的创造。我们一定想办法战胜灾害”。看完早秧的现场后，紫阳同志便驱车到南部县去了。

紫阳同志，深入实际，工作认真，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领导方法和俭朴的生活作风，我们区委几位同志在他走后的交换看法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是我们遇到的上级领导中，作风最好的一个。当晚我向区委汇报了紫阳同志在富驿所作的指示后，区委决定：以毛主席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学习紫阳同志的优良作风和旱灾作斗争，动员群众大力抗旱。过后，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先召开了电话会，接着又召开了大队一级支委会。会上根据紫阳同志的指示，重点研究了趋利避害的措施：稻田有水源的地方，坚持种麦玉稻；无水源的地方，种玉米、红苕或红麻；旱地早玉米无收的，改种中玉米；中玉米无收的，改种秋玉米；红苕地一律套种中玉米，玉米地套种红苕，农业上受到损失，就大抓多种经营，重点抓养猪、养蚕。天上不下雨，社员无水吃的地方，发动群众找水源，打井吸水。会议过后，党员、干部带头上阵抗旱，广大群众苦干实干，各部门通力协作。富驿粮站准备了充足的抗旱种子，站长带头拉车，把种子送到各生产队；供销社主任带上采购员到青白江氮肥厂组织回化肥，保证抗旱有肥料施用。经过一年艰苦奋斗的结果，粮食虽然减了点产，但在大灾之年仍算是一个好收成；社员吃的虽然主要是粗粮，但尚能安居乐业，无人逃

荒要饭；蚕茧增产二成，红麻丰收，猪牛头数增加；新栽桑树120万株，栽柑桔4.8万株，多种经营出现了一个好势头。在弥江河安装了扬程为80米，四管上水的二级提灌站；开渠21公里，兴修小二型水库二座，打水井1440口，除一些高山住户外，基本上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这时有人把那首灾情歌续了二句，即成：“大旱已两年，灾情大蔓延，万亩田开裂，千流水断源；禾苗半枯萎，人畜饮水难，坚持抗灾害，定收好粮棉。”

紫阳同志视察富驿至今已经十年了，我们在富驿工作过的人，已先后离职，但他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铮铮铁骨深深情

记袁诗尧和李鸣珂

廖仲宣

袁诗尧和李鸣珂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袁诗尧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李鸣珂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袁诗尧和李鸣珂在峥嵘的岁月里，团结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成都高师时，袁诗

尧利用早餐时间，首先向同学们宣读了川报上的有关报道。在他的带动下，组织高师同学参加了三十余所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在“致公堂”前广场的大会，大家一致决议，声讨卖国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对德和约上签字，要求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袁诗尧代表成都学生草拟通电，发出宣言，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6月3日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张秀熟被选为理事长，袁诗尧被选为副理事长。他首创和主办了《四川学生潮》，这个周刊，笔锋新颖文章泼辣，无所忌憚，猛烈地向封建礼教挑战，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是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文化的主要阵地之一。

就在这时，李鸣珂正在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读书。他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加集会，上街宣传，焚毁日货，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在斗争中认识了袁诗尧。以后在“军学冲突”和“商学冲突”中他们并肩战斗，情谊深厚。这时吴玉章同志从上海、广州受孙中山委托来川工作，他非常关心四川学生的这次运动，很快袁诗尧和李鸣珂结识了吴玉章，并得到了吴玉章同志的器重，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暑假，袁诗尧在成都高师校毕业了。他应张澜先生的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兼端明女中，顺庆联中的课。与张秀熟同志一道，积极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宣传。

1922年，李鸣珂在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毕业，经学校和袁诗尧推荐，回南部县任实业所长。他朝气蓬勃，决心大干一番，改变家乡面貌。在县城创办了农业训练班，招收知识青年170多人入学，学技术、学政治，毕业后分回各乡办桑园、

苗圃和林场，有的还开办缫丝厂。工作成绩异常显著，深受县人欢迎。同时，还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和新文化，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演出文明戏（话剧），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寓教于乐，传播新思想。又与进步青年李载溥、赵文浩、马安华等组织青年义勇团，发动和组织群众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

这时县知事毛光祖和当地恶霸豪绅对李鸣珂十分忌恨。李鸣珂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一方面紧密团结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一方面向驻顺庆（南充）的川军师长何光烈控告毛光祖贪赃枉法的劣迹，并吁请袁诗尧鼎力支持。同时还通过成渝两地有关人士，登报和散发传单，揭露毛光祖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草菅人命，残民以逞的罪行。这时在南充驻防的何光烈慑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群众的压力，伪装进步，戴着假面具，阳奉张澜先生为师，声言要帮助推进地方事业。当他收到李鸣珂等揭露毛光祖的控告书和袁诗尧向他提出惩办毛光祖的强烈要求后，他迫不得已，装着一幅嫉恶如仇，清正廉明的样子，撤去了毛光祖县知事的职务，改派林伏崇继任。

毛光祖丢了官，土豪劣绅余锦江、颜万鉴等更加仇视李鸣珂。他们诬蔑李鸣珂宣传共产，赤化民众，捣毁庙宇，不孝不忠，分别向省署、道尹、防区等控告。林伏崇虽倾向进步，但难为申辩，执拗不过顶头上司，只好将李鸣珂撤职。

当李鸣珂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南部县各界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官府此举极为不满，咒骂他们践踏民意，迫害无辜，为李鸣珂深抱不平！

这时，张澜先生在南充极力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同时以

革新地方教育与兴办实业为志。在他首次出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把县上的县立高级小学，县立中学合为一校，分设普通师范、农蚕、工业、医学等五部，先后招收农业、工业、医学、蚕桑等专业班学生入学，并修建蚕室、贮桑室、烘茧灶、缫丝厂，培植专用桑园，添置养蚕设备，购置织绸机具，与本地染织业合作，成立嘉陵织绸厂，初步奠定了蚕桑、丝织等专业的基础，鼓励学生半工半读，劳动实践。并四处聘请名师，一时，南充中学成为四川省有名的学府，四川各地的青年来南充求学者颇多。

李鸣珂这时愤然离开南部到了南充，经袁诗尧推荐，张澜先生聘请了他担任南充中学农蚕部的教员。

袁诗尧和李鸣珂在学校满腔热情地给学生推荐《新青年》、《响导》等进步刊物，组织他们学习阅读，使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日益浓厚，打开了青年们的眼界，哺育他们成长。同时组织学生举行学习讨论会、辩论会、学术研究会、举办讲演学习竞赛，活跃了民主空气。还引导、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活动，支持他们走向街头，走向社会，教唱进步歌曲，宣传革命思想。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使很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时的四川，军阀割据，拥兵自雄，争权夺势，霸占地方，各自为政，自委官吏，征收租税，大肆扩兵。军、团、匪肆虐，老百姓遭殃。兵越打越多，仗越打越大，整个天府之国呈现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李鸣珂面对这一现状，经深思熟虑并充分听取袁诗尧意见之后，于1924年毅然弃教从军，到川军何光烈师二十团任一等书记（文书）。当时刘伯承在川军中当团长，经同乡贾

良俊介绍，李鸣珂与刘认识，后在斗争中结为战友。自此，李鸣珂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武装斗争，英勇善战，坚毅顽强，充分展示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华。

1925年春天，袁诗尧应家乡热情邀请，离开南充回盐亭县任教育局长。后辗转于三台、成都等地，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他冲天的干劲，坚定的意志，无畏的精神，丰赡的才华，灵敏的机智，在敌人千军万马中纵横驰骋，旁若无人的英雄气概，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竭忠尽智，赤胆红心。不幸于1928年2月1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下莲池。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当袁诗尧壮烈殉难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李鸣珂正在中央军委工作。他这个昂昂七尺躯，巍巍三寸舌，热泪不轻弹，秉性唯刚烈的“老军务”也悲恸不已，伤感万分。不由得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他决心以袁诗尧为光辉榜样，继承先烈遗志，为完成先烈未竟事业向着国民党反动派而冲锋陷阵，英勇斗争！

为了加强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力量，1928年夏，经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负责全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1929年春，四川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李鸣珂被选为省委常委。他在省委领导下，发动工农群众，搞兵变、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他和省委集体象一团熊熊的火焰，燃烧着重庆，照映着全川！使军阀刘湘一伙胆颤心惊，丧魂落魄。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四处网罗大小军阀联合“剿共”。同时采用各种

卑劣手法，收买叛徒，以破坏革命。

1930年4月18日清晨，李鸣珂与邓文书等同志外出执行任务，刚走到朝天门码头，碰巧正遇上叛徒易觉先带了几个匪徒破坏我江北特支机关回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易觉先得意忘形地指使特务捉拿李鸣珂。李鸣珂临危不惧，首先连发两枪，打死叛徒易觉先。接着又机警地连发数枪，先后打倒几个匪徒。枪声惊动了城防司令部和团务局航管处，出动了大批匪兵，李鸣珂等不幸被捕。19日午后，李鸣珂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重庆朝天门外。时年三十一岁。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感人至深的光辉事迹，学习先烈们博大的襟怀，真挚的情谊和英勇献身慷慨捐躯的革命精神时，将极大地激励我们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更加刻苦学习，忘我地工作，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用优异的成绩为四化大业献计出力。方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无愧于对先烈们的缅怀！

凛然正气蒙文通

廖仲宣

现代中国史学家蒙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生于1894年秋。他在青年求学时，才华横溢，写出了《经学导言》一书，送与经学大师廖季平老师阅后，廖即手书数张与蒙。其末曰：“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

家，道献所疑，以待评定。”这件事在同学中一时传为佳话。

他一生中，著述宏富，在国内享有盛名。在经学方面著有《经学导言》、《经学抉原》、《儒学五论》、《孔氏古文说》；在史学方面著有《古史甄微》、《中国史学史》、《秦之社会》、《巴蜀史的问题》；在地理方面著有《古地甄微》、《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成都二江考》、《汉漕亭考》；在佛教哲学方面著有《中国禅学考》、《微识新罗学》；在道家方面著有《杨朱考》、《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在中国古代经济方面著有《周代之商业》、《汉代经济政策》、《宋代的商税》、《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等等，共数百万言。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他一生的气节，是令人肃然起敬的。1931年他在成都大学任教授时，因反对四川军阀摧残教育事业，以武力强行裁并川大、师大、成大三校的主张，遂愤然离川。这时恰遇河南大学来请，便前去开封任教。1933年去北平，任北平大学教授。不久日本东方图书馆长乔川时雄，在北平等地大肆搜求我国明清以来未刊刻而很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数十万册准备编写提要。了解到蒙文通学识渊博，力能胜任。便托人劝说，许以重金—每月四百至六百元（大洋）为酬谢。这时蒙文通在北大每月薪津仅有二百四十元（大洋），收入不多，兼之一家六口相随，负担很重。尽管如此，他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没有丝毫媚外的奴颜软骨，不为金钱所动，婉言拒绝了。乔川时雄还不甘心，便亲自出面相求，仍被谢绝。以后蒙文通在天津，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这

时正是日本法西斯军阀大举侵略我国，积极向关内进攻之际。1935年5月，日寇侵略华北，国民党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这时便大肆鼓吹“中日提携”。友朋中竟有人厚颜无耻地多次动员、劝说蒙文通从事这方面的写作，并以重利为诱饵。但他觉察到这是日伪的圈套，乃断然拒绝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我国芦沟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平津相继陷落。蒙文通惟恐落入日伪之手，乃率全家避入租界，后买外轮浮海回到四川。其民族气节，着实令人敬佩！1939年他在四川任教期间，新任校长程天放，是国民党的党棍。在学校里专以监视进步教师、学生的思想言行为职志。蒙文通因见国民党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特务横行，人民受难。讲课时多次进行揭露，讽刺。程天放知道后，竟将他解聘了。这时东北大学已迁入三台县，他便应邀去该校任教。

解放后，执教于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先后被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委员。

1963年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委员扩大会议，蒙文通应邀参加。受到毛泽东、刘少奇两位主席的亲切接见。会后蒙氏语人说：“我之所以被召见，非为我学有所长，大概是因为我过去在平津时能拒绝日伪的拉拢，表现出了民族气节，才受到两位主席的青睐罢了。”

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来临，蒙文通被污蔑为“反动学术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横遭迫害。一

次在被批斗时，有造反派十分恶毒的拔他的胡须，他忍无可忍，愤怒已极，厉声斥责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在那群魔乱舞人妖颠倒的岁月里，尽管白天他要被滥批乱斗，或去牛棚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但夜晚回到家时，仍然顽强地撰写《越史丛考》（1）一一考证，批驳那些自命为研究越族史的行家所认为的：中国大江以南悉为越地；瓯、骆是一国；骆越原拥有今广西省的一部分土地；越裳即在今之江西等望文生训，错谬百出的论断。

书刚成，不幸于1968年6月竟含恨辞世矣！

蒙文通教授离开我们已二十年了，但他那崇高的爱国精神，凛然正气，铁骨铮铮的一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从中吸取力量的。

（1）.《越史丛考》一书，由蒙教授次子默于1983年整理问世。同年10月3日《人民日报》载邓卫中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考订该洽，纠谬释疑的史学新著。

成都医生在盐亭

杨 作 清

事情已经过去十多二十年了，但每念及此，无不感慨万端。现记录于后，无非望对来者有所启迪。

田子朴输血

一九六九年秋天，成都市部分医生，不愿呆在城里闹“革命”，由四川医学院保卫处长李海深、成都中医学院共青团委书记郭展带队，组成了有李魁岸、田子朴、冉品珍、廖孔宇等教授、副教授参加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小分队，来盐亭黑坪区进行医、教、研三结合试点。消息传开，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医生们耳闻目睹边远山区劳苦大众贫病交加，缺医少药，非常同情。一个个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解除病人疾苦。纷纷献计出力，创造条件，开展医、教、防、研活动。同志们住草棚、蹲树荫、顶烈日、踏寒冰、劳筋骨，饿体肤，心情舒畅，任劳任怨，深受群众欢迎。群众中广泛传颂着：“城里医生进山村，山村面貌焕然新，少花钱粮治好病，真是人民的大恩人”。群众反映的并不过头，请看“田子朴输血”一节吧。一九六九年初冬龙泉边远山乡赶来一例重危病人，经检查需立即动手术，然而血源不足，难予组织。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外科医生田子朴（现华西医科大学胸外科主任副教授）毅然伸出左手，无偿献血100毫升。田医生的无私精神带动了干部群众，献血的献血，捐钱的捐钱，送粮的送粮，使这位重危病人得到了抢救，恢复了健康。临走时，拉着田医生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田医生啊，田医生，你真是党的好儿子，你救了我的命，我子子孙孙永远也忘不了党！”

曹泽毅出诊

一九七三年夏天的一个中午，骄阳似火，好像要把整个

大地煮沸似的。玉龙区卫生院的病房里围着一大圈医生、护士和群众。一个个都以焦虑的心情，异口同声地哀叹道：

“唉！多可怜呀！年轻轻的！”原来他（她）们正为着一个病危的产妇焦急。这个产妇名叫杨德芬，三河乡人，刚满二十岁，体患“产后子痫”，经治疗无效，病情恶化，已发展到牙关紧咬，四肢抽搐，神智昏迷的休克状态。尽管人同此心，还是爱莫能助。正在此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问：“为什么不请县医院出诊呢？”一句话提醒了院长，他根据群众建议，马上给县医院挂电话请出诊。县医院妇产科医生郑益接电话后，马上把这例病情向正在县医院会诊的川医赴盐医疗小分队队长曹泽毅同志（现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妇产科教授）汇报。曹泽毅同志听了病情介绍后感到问题严重，非自己亲自出诊不可。便决定牺牲午睡，找车出诊。曹泽毅同志这种救死扶伤精神，得到了县委的支持。县委办主动派车送曹泽毅同志前往玉龙。到玉龙后，他顾不得汗流浹背，直奔病房，参加抢救。和当地医护人员一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病情缓解了，病人苏醒了，曹泽毅同志和大家一起制订好医疗方案后，才迎着夜幕返回四十里外的黄甸住地。时间过去十多年了，这位被救的妇女生活过得很幸福，每一提到曹队长，她就声泪俱下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医风，没有曹队长就没有我这条命。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不忘曹队长啊！”（待续）